



Z 天行健

92岁游本昌宣誓入党

七一前夕,在鲜红的党旗下,92岁的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游本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完毕,他用微微颤抖的手,珍重地抚摸着胸前闪亮的党员徽章,他说,“现在,我是党的一名‘老学生’了”。

幼年时期的游本昌,曾亲身经历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腐败,而上海解放那天,他目睹了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信仰的种子也在心中扎下了根。

2024年5月30日,91岁的游本昌向党组织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整整21页,全部钢笔手写。

其实,游本昌今年年初刚经历了生死大关。“父亲一度健康状况告急,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女儿游思涵说,抢救几天后,父亲醒来对家人说,最危重之际,他虽无法言行,但神志清晰,“我觉得自己还有事没完成。”

□ 孙佳音
上观新闻 7月1日

■ 延伸阅读

中国共产党
党员总数超1亿名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24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027.1万名,比上年净增108.6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25.0万个,比上年净增7.4万个。

新华社 6月30日

Z 流金岁月

为《新青年》走上独立创刊之路
陈独秀与发行书社对簿公堂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为唤起更多民众的爱国良知,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翻译成英文,印刷成中英文传单。6月11日,陈独秀在香厂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时被捕。

陈独秀入狱,《每周评论》暂时没受影响。这是一份《新青年》编辑同人创办的“专谈政治”的小报。于是,胡适成该报的主要编辑。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发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和李大钊辩论时,陈独秀仍在狱中。1919年9月,被关押了三个多月的陈独秀出狱了。他写了一篇题为《主义与努力》的短文,表明立场,一方面肯定了胡适的“一点一滴改造”,另一方面把主义比作行船的方向,“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1919年年末,章士钊、汪精卫邀请陈独秀与蔡元培、吴稚晖南下,一起筹办西南大学。可是陈独秀虽然已经出狱,人却还在警察的监管之下,不允许他随便出京走动。

陈独秀是如何安全离京的,胡适和高一涵都有生动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北京陈独秀故居)。

记述,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到,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化装成生意人,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陈独秀上船前往上海。

而高一涵在1927年所做《李守常(李大钊)同志事略》中,还提到一个细节,说陈、李二人“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骡车之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最早出处。

不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不是在骡车之中?高一涵的说法真实性存疑。据考证,他在1919年年底去了日本访学,1920年6月才回国。也就是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时,高一涵并不在国内,也就不可能见证“南陈

北李,相约建党”。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佳话确是史实,只不过他们相约时,已经是1920年9月的事了。而且,从陈独秀的信件和发表的文章看,他最终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应该是在1920年四五月份。

《新青年》的编辑事务随陈独秀迁到上海。当时,陈独秀在上海一边忙着筹备共产党组织,一边负责《新青年》稿件的撰写、征集和编辑,诸事缠身,十分焦虑。负责发行的群益书社又因为杂志定价,跟他“一天之内起了两次冲突”。

《新青年》的影响力不是

8月,负责发行的群益书社以印数太少、销路不畅为由,一度停止出版《新青年》。

双方争执不下,陈独秀一气之下,收回《新青年》杂志自办发行,成立了“新青年社”。群益书社一纸诉状,把陈独秀告上法庭,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恰在此时,共产国际远东局派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与李守常(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南下到上海与陈独秀诸人会面。维经斯基愿意为《新青年》提供资助,这对处在困境中的陈独秀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1920年9月,停刊4个月的《新青年》复刊。《新青年》实际上已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公开发表《谈政治》,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成为中共理论刊物,直至1926年7月停刊。自《新青年》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陆续又有一大批报刊、通讯社选择“落地”上海。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或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创办的。

□ 张小英 陈逸君 张丁
综合自《北京日报》
《解放日报》《人民日报》

Z 研学游

“飞夺泸定桥”,
游客与先烈前辈“并肩作战”

随着暑期临近,红色旅游不断升温,红色旅游景区的游客逐渐多起来。走进位于四川泸定县的飞夺泸定桥·渡河纪念馆互动空间,游客戴上VR眼镜,拿起道具枪,脚下是翻腾奔涌的大渡河水,身边是正在行军的红军战友,1935年“飞夺泸定桥”战争场景就这样呈现在眼前。“场景太逼真了!与先烈并肩作战、手持枪械与敌人搏斗,炸弹在身边炸开,还有震动、风、水等特效,就像身临其境一样!”游客陈希在体验项目后惊叹地说。

红军日行240里的壮举,在VR视角里变成不断加速的森林草甸,脚下的路变得可知可感。游客成为战士,和先烈前辈“并肩作战”,踩在虚拟泸定桥的钢索上,沉浸式参与这段红色历史,其中的震撼和教育意义自然会在体验后,留下属于每个人自己的答案。

□ 鲁元珍 周宝阮 吴忧 李婷 宁霖
《光明日报》四川在线
6月23日、29日



“飞夺泸定桥”VR场景概念图。
图片来源:泸定旅游微信公众号

Z 春秋纪事

建党日庆祝活动的由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之所以有“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的规定,就是为了在险恶的环境中保护组织和党员。由于是秘密建党,所以不可能留下开会日期记录的确凿资料。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这个具体日期是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党史工作者仔细考证各种历史资料后才确定下来的。在国内现存史料里,记叙中共一大情况最早的历史文献是中共一大湖北代表陈潭秋撰写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一文。这篇文章写于1936年上半年,发表于《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陈潭秋在文中回忆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底开幕的,但具体哪天还是不详。

据《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书披露,1938年年初,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诞辰,全国许多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延安的同志,向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时间。可是,他俩都说不清。于是,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后,说:“这样吧,就用7月的第一天作为纪念日。”这个结果在该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得到体现:“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首次把建党日确定为7月1日的历史文献。

中共中央首次正式举行建党庆祝活动是在194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的时候。这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用文件形式把7月1日作为建党日正式确定下来。

□ 齐卫平
《党史纵览》

李汉俊:从“官费生”到马克思主义启蒙者

“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1890年4月,李汉俊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垵墩垸(现潜江市)一个教书先生之家。他6岁进私塾念书,有着过目成诵的聪慧,并长于辞令辩才。李汉俊年幼时曾听父亲讲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故事,从中学到了许多爱国历史知识。

1902年,年仅12岁的李汉俊在其兄李书城及李书城挚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求学。他初“进法国教会学校晓星中学校,升入日本高等学校后,改为清政府的官费学生,以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留日期间,他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先驱者河上肇的影响,毅然放弃了较为喜欢的数学,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

1918年年底,李汉俊带着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报刊回国。李汉俊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翻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校对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等,他以“人杰”“汗”“先进”等笔名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妇女评论》、《劳动界》等报刊上发表马克思主义译作和多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文章。1919年10月,英国在华情报机关收到报告称,李人杰(李汉俊笔名)是两名居住于上海法租界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之一。

李汉俊在上海结识了詹大悲,经詹大悲介绍,又认识了董必武。李汉俊向董必武、陈潭秋等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推荐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几位湖北人在黄浦江畔彻夜长谈,中国革命要胜利,非遵



“（2021年）7月1日那天,妈妈让我把平板电脑带到医院,在病房里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直播。”黄健(李汉俊外孙)说,母亲看完纪念大会后很激动,说自己替父亲看到了今天的盛世,这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



▲李汉俊与陈静殊结婚照。

从马克思主义不可。1971年8月4日,85岁高龄的董必武回忆中共一大和共产党湖北早期组织的情况时,多次谈到李汉俊,其中谈道:“五四运动时,各种思潮都表现出来……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运动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

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看政治经济学入门,到底是谁的主义,还是帝国主义,我们也弄不懂,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

与密探和巡捕从容周旋

1921年7月30日晚,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寓所中秘密举行。会议刚开始,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又匆匆退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判断此人是密探,建议立即休会,大家迅速分散离开,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

代表们撤出会场仅十多分钟,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警车便呼啸而至,车上冲出10多个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3名法国警官带着4个中国密探进入了室内。他们不由分说,翻箱倒柜地搜查,随后又跟进来几个翻译。他们在李公馆仔细搜查了足足一个小时。

其实在之前搜查的时候,巡捕们搜出一份党纲的草案,但因字迹模糊,涂改得很乱,他们以为是一份无关紧要的碎纸,没有重视。这次搜查过后,法国总巡傲慢地用法语盘问道:“谁是这屋子的主人?”“我。”李汉俊从容地用法语回答:“你们知不知道开会要事先上报告?你们在开什么会!”“我们只是几个北大教授在谈论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并没有开会。”总巡恶狠狠地瞪着眼,问道:“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还有,刚刚那两个外国人是谁?”李汉俊不慌不忙地回答道:“我身兼商务印书馆编辑,也是一名教员,所以,什么书都要多看看,也作为

参考、研究用途。至于那两个外国人,他们只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跟随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来上海探讨学术问题的,在这里聊聊天。”

李汉俊的长女李声馥在《我的父亲李汉俊》一文中转述继母陈静殊的回忆:“当法租界巡捕搜查时,父亲发现会上起草的党的文件正压在桌上玻璃板下,他一面用法语与巡捕们交谈,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一面机智地用身体挡住桌子。这样文件才没有被发现,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的发生。”

几代人传承红色家风

1927年,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被捕,当晚9时被杀害,时年仅37岁,是中共一大代表中英勇牺牲的第一人。

1952年,毛泽东主席为李汉俊烈士亲笔签发了0011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面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我妈妈(李声馥)一辈子不过生日,我们要给她过,她总是不肯,因为她的生日和外公李汉俊的忌日太近了,只相差二十天。”武汉大学动力与机械学院退休教授黄健说,母亲虽然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但父亲依然影响着她的一生,特别是她的信仰。

“外公李汉俊牺牲后,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舅舅李声簧投身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他才13岁。”黄健说,舅舅李声簧1927年入团,1929年入党,一直坚持革命斗争,离休前任中

国科技出版社副总编辑。姨妈李声馥一生从事医护事业,同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退休前是武汉医院护士长。

李汉俊曾在武汉大学任教接近6年,以讲坛为阵地向青年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位把唯物史观列为高校教学科目的教授。他为人师表的风范在后人当中得到了充分传承,女儿、女婿、外孙、曾孙等一家几代人都与武汉大学有着深厚缘分,都曾在武大求学或任教,在教育界公布的全国首批100个教育世家名单中,便有黄健家庭的名字。

“（2021年）7月1日那天,妈妈让我把平板电脑带到医院,在病房里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直播。”黄健说,母亲看完纪念大会后很激动,说自己替父亲看到了今天的盛世,这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7月23日,黄健将母亲的50万元存款捐给了武汉大学。

“‘一大’召开时,党的经费困难,李汉俊曾把妻子的嫁妆全部当出作为党的活动经费。我妈妈在外婆去世后,将自家的住房捐给了国家,临终前又将自己最后的积蓄全部捐出。这也是对外公精神的传承吧。”黄健说。

(本版有删节)

□ 李凡 姚鹏 余玮
综合自 CCTV 国家记忆微信公众号、
《中国妇女报》、人民政协网

赓续红色文化基因
荟萃红色法治故事